

中国人民大学校长、教授，著名经济学家 刘伟

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 转变发展理念应对挑战

在第九届全国陶瓷人大大会暨第二届中国陶瓷品牌节上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、著名经济学家、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伟作《中国经济形势与对策》主旨演讲。以下为演讲实录：

非常高兴有机会受邀参加“第九届全国陶瓷人大大会”，分享这一年的体会和分析未来的趋势，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我给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我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。

我想谈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“怎么看”，就是怎么认识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出现的新变化、新特征、新问题、新矛盾；第二个问题是“怎么干”，怎么理解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的调整，以及政策演变的趋势。

2019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现了“稳”

首先谈“怎么看”，怎么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。比较突出的宏观经济运行特点，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，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新的水平，从今年的情况来看，尽管面临着国内、国际各方面的压力，但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上是在我们年初“两会”确立的经济政策目标运行范围之内，如期实现了今年年度经济增长目标。

我们主要的经济指标，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，今年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%—6.5%，从前三个季度的数据来看，应当说在6.3%、6.2%左右的增速，问题不大。

通货膨胀率，年初定的目标是3%左右，今年虽然有一个猪肉周期涨价，涨了120%多，除了这样的偶发因素，总体CPI（消费品价格指数）是在3%以下，也就是说，达到了3%左右CPI的控制指标。

第三个经济指标是失业率的控制，今年年初提出来的调查失业率，我们要控制在5.5%左右，至少需要11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，但今年前三个季度我们新增了1300多万个就业岗位，所以从前三个季度来看，预计今年调查失业率能够控制在5%以下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

外贸方面，今年前三季度的外汇储备达到30900多亿美元，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上，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并且直接利用外资的增速，今年全年是正值。

去年，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，国内外一些悲观论者预言，中国经济可能在2019年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——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、结构性失业严重，以及一大批外资逃离。但综合宏观经济指标，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现了“稳”，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物价、稳外贸、稳预期、稳外资。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，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。

中国经济进入到下行周期

稳定增长的情况下，中国经济进入到趋势性的下滑周期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今年我国GDP如果增长6.2%、6.3%，那么GDP总量将突破100万亿元，折合成美金是14万亿美元左右，占全球比重的16%以上，美国今年预计会突破20万亿美元，我国GDP现在相当于美国的65%，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我国人均GDP去年按汇率是9600多美元，如果今年同步增长，将突破1万亿美元。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国家，现在世界上有70个，如果达到4055美元以上，叫上中等收入国家，现在世界上有54个，中国是2010年达到4055美元以上，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。

所以，中国人均GDP过了1万亿美元以后，仍然是上中等收入国家。但是，这里出现了一些变化，去年全球人均GDP11100多美元，也就是中国即使用了1万亿美元，仍然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。

全球高收入国家有70个左右，它的最低统计线12000多美元，平均水平是

41000多美元，也就是我们距离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距离还非常大，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，它的人均GDP都是5万多美金，甚至更高，我们距离更大。

从发展史来看，一个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以后，会出现一个大台阶，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从高速增长走向中速，甚至中低速增长。历史上，50年代到70年代之后的日本，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的韩国，以及新加坡等国都经历了一段20年、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。但到了1万美金之后，就开始掉到一个持续低速，或者中速、中低速的增长区间。

中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金以后，进入“新常态”。其中的突出特点是，经济步入“三期叠加”状态。第一期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，从高速增长走向中高速、中速增长；

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镇痛期，长期的高速增长，积累了很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，解决起来非一日之功，所以叫镇痛期，而且结构调整很困难；第三期是退出反危机之后成本的消化期，我们把低效率项目退出以后，需要付出代价。

三期叠加在一起，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矛盾、新特点，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，我们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挑战。从国内经济来说，人均GDP突破1万美金以后，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，也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的跨越，进入到高收入行列。

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，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阶段，平均用时是12年04个月。这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，有20个是人口大国，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，人口大国起飞阶段慢，摆脱贫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多、时间长，但是它的加速更加迅猛，人口大国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平均用时是11年09个月，中国是最大的人口大国，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行列，能不能用10年或者略多的时间完成这一跨越呢？如果用10年，那就是2020年人均GDP达到12000美金。

中国有两个“百年目标”：2020年大体赶上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，2050年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。但是这条路走起来不是顺理成章的，全球100多个发展中国家，真正跨入到70个发达国家行列的只有13个，剩下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大都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。比如，拉丁美洲十几个国家，人们叫“拉美漩涡”，还有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等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，30多年了现在还跨越不过去，还有上世纪90年代，叙利亚、埃及等国家，现在20多年了跨越不过去，这些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。

中等收入陷阱对我们国家来说，跨越过去总归需要跨越的，问题是怎么跨越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？这就是我们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。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，我们要习惯这种常态，要在这种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。

在国际社会上，我们面临另一种挑战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意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，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，这样冲突不可避免。历史上，近代革命首先是荷兰，有“海上马车夫”之称，然后英国把它干掉后崛起，两次世界大战发生欧洲，就是老大和老二打架，打的结果是美国崛起。

1980年代，日本经济体量曾经逼近过美国，1985年在纽约广场饭店日本跟美国签约，进行核心贸易谈判，谈的结果不是贸易问题，是竞争机会问题。日本资本进入美国的产业市场要经美国同意，美国资本进入日本市场，日本人不



能反对，我们现在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“霸凌主义”，这一举奠定了90年代信息产业过程中，日本资本的退出，要美国资本让路，日本落伍就是落伍在这个地方。

“老二”的GDP只要赶上美国的60%，美国就会全面跟你干。2018年，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%，特朗普主动发起中美贸易战。中美贸易战是准入问题，是发展权的问题，所以有人讲，美国不是要你的钱，是要你的命。

国际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有历史性的根据，它不是中国的特例。在这种矛盾条件下，中国经济增长在新的阶段上，可能要告别过去的持续高速增长，人们要适应新的增速甚至更低的增长时代的到来。

这是我讨论的第一个问题“怎么看”。一方面确实经济宏观指标如期实现，第二方面就是进入到一个下行轨道，这种下行轨道的原因是深刻的，有国际、有国内、有现实、有历史的原因。

转变发展理念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

第二个问题“怎么干”？就是怎么理解我们国家党和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，前面说到它有深层的原因。怎么遏制经济下行，首先就是要树立新理念，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理念，按照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，我们的发展理念是“三步走”战略，第一步10年左右时间解决温饱，第二步20世纪末初步实现小康，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。

后来又提出以GDP来衡量，第一步GDP翻一番，当时人均GDP200多美金，翻一番是500美金；第二步是翻两番，达到或接近1000美金，实现初步小康；第三步是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。

“三步走”战略提出来的理念，实际上就是以GDP增长为核心，10年翻一番，以摆脱贫穷为目的，迅速摆脱贫困。这个方略、理念在那个年代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穷，主要矛盾是贫穷，所以小平同志说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。

现在进入到新时代，我们已经摆脱了贫穷，主要矛盾是要从富起来，走向

强起来，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衡、不充分之间的矛盾。说白了，贫困时期我们要解决的，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，那个时候都没有饭吃，还谈什么营养。现在摆脱了贫困，富起来以后，我们要解决的，不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，而是解决好还是不好的问题。

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任务，这个任务是历史时代提出来的。马克思有一句名言，叫“问题是时代的口号”，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们创造了人类世界最成功的反贫困奇迹，现在进入到习近平新时代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实现现代化，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，这个问题需要这个时代的人来承担、解决。

所以这个时候要转变发展理念，不能再用过过去以GDP为核心，翻番式快速增长为方略。“十八大”以后，我们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：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。提出来以后，如何落实？要落实得有途径，通过什么机制，通过什么方式、路径来落实、贯彻？

“十九大”报告说得很清楚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。提出“五大战略”，第一个战略是，壮大实体经济，特别是制造业，要做精做强。我国的制造业门类很全，拥有41个工业大类、207个工业中类、666个工业小类，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，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但关键产品、关键产业链受制于人。这个矛盾很突出，所以要壮大实体经济，做强制造业。

第二个战略是创新驱动。第三个战略是振兴乡村、合理布局，缩小城乡差距，然后培养新的区域经济热点，像我们最近提出的几大新的战略重点——长江经济带、长三角一体化、京津冀发展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振兴东北、西部大开发、黄河流域生态区的发展等都是布局重点。

第四个战略是新的开放，一带一路，人类命运共同体。第五个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，包括经济改革、政治改革、法治建设。围绕这五大战略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于如

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如何应对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基本逻辑。

经济增长“稳”是短期的 更要紧的是解决“进”

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调是“稳中求进”。稳就是指经济增长要稳，避免大起大落，大起经济会过热，导致通货膨胀、社会不稳定；大落会导致社会动荡。因此，每一年的年度宏观经济政策，在政策的制定、衔接上要保持稳，今年更是稳字当头，保证实现六稳，既不过热，也不过冷。经济过热，其他条件不变，物价上涨；经济过冷，经济衰退高失业。

明年，中国经济增长控制在6%左右的速度，估计通胀率不超过3%。如果明年的失业率目标还是控制在5%左右、5.5%以下的话，我们经济增长的下限至少要达到5%，才能够保证明年经济增长当中的失业率。确定合理的目标，建立有机协调的联系，这是宏观经济“稳增长”中首先要考虑的。

但“稳”只是短期的，更要紧的是解决“进”，“进”重在通过深化改革，克服供给侧深层次结构性矛盾。解决的关键在于，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等几方面的推动，通过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，解决新的成长阶段深层的结构性矛盾。有了“进”，才有长期“稳”的基础，有了“稳”，才有“进”的时间窗口。

现在为什么要深化供给侧改革？因为卖不动，所以要提高质量与竞争力。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最要紧的问题，最大的风险是失业，容易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，所以必须要有“稳”，创造基础前提条件，打开一个时间窗口。但是这个窗口不是长期的，打开以后要抓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，提高竞争水平，切实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的生产率，解决深层的结构性矛盾。

“稳”与“进”之间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。“稳”是“进”的前提，没有“稳”就不可能具有“进”的宏观经济条件；“进”是“稳”的根本，没有“进”就不可能具有长期“稳”的经济增长基础。

(操儒冰整理)